

当你走进动物园

来颖燕

春天不是读书天，只是要上学的孩子们只有在学校例行的春游那一天，可以大方而理直气壮地将这句话放到台面上。待到春游归来，老师一定会布置一篇游记。记得大多数的作文开头，都会诉说自己春游的前夜如何兴奋激动、辗转难眠，乃至梦中的情境也是坐上了去春游的大巴。落在这样的俗套中，我们不会有互相抄袭的顾虑，因为那是遵循了老师的教诲；作文要真情流露。这真情看起来千篇一律，却是实在的——面对内心的悸动，那时的我们难免词穷。草长莺飞，一切都是未知的，萌动的，暗合着内心的秘密。尽管接下去会面对一系列缺乏新意的标配——红宝橘子汽水，纸杯蛋糕，跳跳糖，乃至地点也是常设的，比如动物园，但它们不会稀释我们的渴望，反而成了一种标识，预示着明媚春光里的奔跑和拥抱。直到现在，那些肆意和纵情的欢笑，依然会在春日清风里招摇。只是回头望，会渐渐明白，对春游如此的渴望，根底上是因为可以偷得一日逍遥，将上课的铃声抛至身后，至于去哪里，并不重要。但老师们为什么总是总意动物园呢？今天的我们，完全能设想老师们的作答——因为春游是为了让你们亲近自然，动物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能轻易料及的答案，总是脆弱的，带有令人质疑的基因。

但不管如何，这个观念深烙在心，以至于即使在长大之后，会在觉得压抑时，会在幻想要汲取自然的力量时，想到去动物园，并且会自然地想到学生时代春游的标配地——上海动物园，上海人习惯性地叫它西郊公园。西郊，内涵着曾经的地理和年代上的遥远。这么多年来，这个古老的动物园翻新了许多设施，迎进了很多闻所未闻的动物族群，但是曾经的印记都在——参观路线，场馆基地，甚至是指示牌。我禁不住会想，小时候我见过的那些猩猩、大象、长颈鹿，现在还有哪些曾经见过那时的我？但阅历渐长，事实上，每去一次动物园，我都会去动物园是为了亲近自然这个看似是公理的观念多一层疑惑。

上海动物园一直有一个庞大的动物标本，伫立在入园不久处的爱心亭里。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它时的震动乃至恐惧，当时磕磕绊绊地读一旁的介绍牌——长颈鹿“海滨”，1978年出生于日本横滨，1980年7月5日赠与上海动物园，开始取名“海滨”。1993年7月12日早晨突然腹部剧痛，犄角抵墙，惨不忍睹，虽经全力抢救，终告不治，于上午九时半死亡，遗留下出生仅二十八天的第六胎幼鹿，哀叫不已，令人唏嘘。经解剖在“海滨”胃中堵有两大团球状塑料，系平时误食游客抛掷的食品塑料袋所害。”

喂食动物不仅危险，甚至残忍。然而，喂食行为却依然时有发生，至今在动物园的许多区域，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区，园方录制的“请勿投喂”的录音循环不绝——猴子们甚至将长臂伸出铁笼主动乞食。料想人们投喂动物的用心并不至于险恶，但既知后果恶劣，又为何屡禁不止？因为想获取动物的注意力。为什么要获得动物的注意力？因为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对于来了又去、聚了又散的游客群，眼神是空洞的，淡漠的。喂食或者是游人可以见到的唯一诱惑动物们靠近自己、关注自己的方式。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从来扑朔迷离。达尔文的进化论虽无法获得完全

的共识，却已经毋庸置疑地深入人心，以至于似乎要退一步，人类的生命才会降格、与动物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在人类对于自然的未知和恐惧里，动物的影子一直在影影绰绰。只是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让人们觉得自己看动物的眼神和动物看自己的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们是被观察和研究对象，是被作为工具和原料的对象，但反之不然——我们与动物的对视并不可能，即使看起来能，也并不平等。我们习惯性地用自己的规则去揣度动物的生命，于是，隐喻诞生了。寓言和童话的世界里，猴子、狐狸、乌鸦、蛇，一切都被借来诠释人类的特点——机敏、狡猾、愚蠢、恩将仇报……日复一日，人们一厢情愿地在想象的天地里为动物们安排序列，幻想能左右它们的世界。我们的自以为是越来越根深蒂固，动物们从真实世界中被彻底边缘化了。孩子们会觉得手中的动物玩偶或是迪士尼里的卡通才是动物该有的样子。

新年伊始，某城市的一家动物园让饲养员分别抱着一只兔子和一只幼鹿，让它们进行交接，以示虎年和兔年的更替。只是，饲养员刚一放手，小老虎就腾地扑向了兔子，饲养员赶紧行动，才避免了进一步的失控。观众惊呼，兔子险些成了老虎的年夜饭。讽刺的是，导演这场失控的交接戏的饲养员不应是最了解动物习性的吗？难道人类真的以为能驯化和改变动物的本性？

约翰·伯格曾经写道：“动物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销声匿迹之际，也就是公共动物园开始诞生之日。人们到那儿去参观、去看动物的动物园，实际上是为了这种不可能相逢而建造的纪念馆。”于是，动物园犹如博物馆，动物当然是了解自然的途径——我们对它一直深信，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极力地为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仿制自然的生存环境，但越是如此，动物园里的动物

就越是被打上了引号，一切都是人造的，虚幻的。它们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自由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的笼子、栅栏、围墙是无声的象征，象征着生命的被制约。所以，我们会想走进动物园，很大程度上，对于自我情感的整理欲求会大于真正的去观察动物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对此并不自知。

记得一个初秋，我去北京开会，好朋友开车接了我，然后问：想去哪里玩？北京的名胜一堆，我一时没有方向，就想着客随主便。出乎意料的是，她说要去北京动物园吧？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有限的在京闲暇时间的安排。她也为自己的想法而兴奋：“我真的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北京动物园了！”

是啊，去动物园是种情怀，带着能重拾天真的希望。

于是，我见到了远比上海动物园更为古老的动物园。一切都大有年代感了，不是历史感。后来得知，这种历史感并非凭空的感觉——它原来是中国对公众开放最早的动物园，始建于1906年，原来是清朝的农事试验场，后来相当于皇家宠物园。据传，还是慈禧下令开放的。时空的惘然，让园中动物的孤独感更显得深重——在玻璃房里一圈一圈绕着走的大食蚁兽，在狮虎山里迟缓漫步的森林之王，在馆舍里无聊地摆着尾巴的大象……它们是闲适的，也是焦虑的。它们或者已经依赖和习惯周围的一切，但再逼真的仿制也永远无法代替真实自然的蓬勃生命力。它们的同伴有限，更缺乏和其他物种的共存，它们被从食物链中孤立出来，同时被从自然中孤立出来。但是它们被边缘化的过程，又何尝不在映射着人类对自我的禁锢？那天，逛到后来，已经傍晚，接近闭园。动物园很安静，也没有播放“回家”的音乐赶游客。初秋年北京还很燥热，但此刻蝉鸣声也开始稀疏。我

有些担心，我们该走了吧？朋友却说，不着急。我于是更着急地问，一会儿闭园啦。但她依然兴致勃勃地拉我去看满笼子蹦跶的猴子。她真的是个天生的小说家，在深吸一口气后，她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不觉得，难得有这样安静的时刻，可以跟动物共处吗？

是啊，人已经太久没有跟动物共处了，哪怕是在片刻的安宁中跟笼子里的动物共处。后来，我读到约翰·伯格援引的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话：“观察禁闭的动物那种不自然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接受并克服我们生活在这个消费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压力。”心里咯噔一下，默默回潮了一下，为什么我会感到压抑时想到去动物园。原来，真的并不是为了接近和感受自然这么表面啊。

而我越发相信，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并不会因为被剥夺了诸多权利，而真的能全面适应人类带给它们的幻象，任由摆弄。它们被迫被动地接受，但也以同样的边缘化的态度来面对人类，所以它们的眼神会有焦点，即使你感觉到它们似乎对你有过一瞥，但那是如何无动于衷的扫视啊。所以，我还在幻想有哪几只动物会记得旧相识的我，实在是自作多情。在动物园里的相逢，带着我们不自知的居高临下，实际上，动物未尝不知这种不对等，也未尝不在报复。这教人想起卡夫卡的话：“他们能够这么自信，只是因为愚蠢。”这话刻薄，但不得不让人低头。当渐渐遗忘了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当对于神秘和未知的生命不再谦逊，人与动物的真正的相互凝视注定要成为历史——“只身前往动物园的游客，在注视过一只又一只的动物之后，会感觉到他自身的孤单；至于成群的游客呢，他们则属于已经被孤立起来的另一类物种”（约翰·伯格语）。所以，也许是时候想一想，你走进动物园，究竟是所为何来？

伏尔泰最有名的哲理故事《老实人》(Candide)的结尾有一句看上去非常简单的话：“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英语中被对应译为“**We must cultivate our garden**”，中文常译为“要耕种我们的园地”。很多人将这句话理解为向往回归田园生活或者是要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际上，伏尔泰的名言别有深意。

伏尔泰以主人公的人名为书名，“Candide”这个单词在法语中是天真、老实、淳朴的意思，音译为“**坎第德**”。他由舅舅抚养长大，这位男爵拥有一座漂亮的城堡庄园。坎第德一直信奉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所宣扬的乐观主义，深信他所生活的城堡就是人间天堂，觉得世上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他和表妹居内贡青梅竹马，两个人互生好感。有一天，坎第德吻了表妹的手，被舅舅逐出了家门，他便从天堂坠入了炼狱，一路上身不由己，浪迹天涯，遭遇各种天灾人祸，不仅挨打被抢，遭受牢狱之灾，而且被卷入战争，还失手杀人，又险些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所幸的是他多次死里逃生。从德国到荷兰，从西欧到南美，坎第德一直流浪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在漫长的旅途中，到处可见惨无人道的烧杀劫掠，他一路所遇之人也是各自遭遇种种不幸。坎第德在途中结识另一位哲学家玛丁，这位悲观主义者告诉他，世上处处是恶，无善可言。天真的坎第德在经历和见证了各种悲惨遭遇之后，不得不去重新观察世界，思考人生。

最后，坎第德与失散又聚、相聚又散的亲友和老师们在东方世界的君士坦丁堡相遇，他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居内贡，这位大家闺秀也经历了很多磨难，早已失去花容月貌。这群人分得一小块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看好的荒芜田地，并不是诗情画意的田园，他们无所着落，怨天尤人，要么争论不休，要么厌倦烦恼：“邦葛罗斯因为不能在德国什么大学里一露锋芒，苦闷不堪。玛丁认定一个人到处都是受罪，也就耐着性子。老实人，玛丁，邦葛罗斯，偶尔谈玄说理，讨论讨论道德问题……不辩论的时候，大家就厌烦得要死。”他们生活不易，苦闷于找不到出路：

玛丁下了断语，说人天生只有两条路：不是在忧患骚动中讨生活，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老实人不同意这话，但提不出别的主张。邦葛罗斯承认自己一生苦不堪言；可是一朝说过了世界上样样十全十美，只能一口咬定，坚持到底，虽则骨子里完全不信。（傅雷译）

在迷茫之中，老实人和老师们去拜访一位修道士，请教他在“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祸”的世上怎么过活，修道士只是说“福也罢，祸也罢，有什么关系？”并不屑于与他们理论。师生一行又路遇一位土耳其老人，老人家与儿女生活美满，于是问土耳其人：“想必你有一大块良田美产了？”土耳其人回答：“我只有二十阿尔邦地；我亲自和孩子们耕种；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恼，纵欲，饥寒。”

坎第德发现普通人的劳作生活比身居高位却常常死于非命的王公贵族的生活和结局要好很多，终于学到可以生存下去的人生智慧，那就是不要空谈而是行动实干，因为只有劳作才能使人摆脱烦恼。两位西方的哲学老师也虚心接受了东方智慧，终于发现人生之要务就是劳作。邦葛罗斯反思说：“上帝把人放进伊甸园是叫他当工人，要他工作的；足见人天生不是能清闲度日的。”玛丁回答道：“少废话，咱们工作罢；唯有工作，日子才好过。”最后，他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形成一个共同劳动和生活的小社会，创造了现实中的一片乐土。

那小团体里的人一致赞成这个好主意，便各人拿出本领来。小小的土地出产很多。居内贡固然奇丑无比，但变成一个做糕饼的能手；巴该德管绣作；老婆子管内衣被褥。连采罗弗莱也没有闲着，他变成一个很能干的水匠，做人也规矩了。有时邦葛罗斯对

伏尔泰· 「咱们还是种地要紧」

车琳

老实人说：“在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你如果不是为了爱居内贡小姐，被人踢着屁股从美丽的宫堡中赶出来，要不是受到异教裁判所的刑罚，要不是徒步跋涉美洲，要不是狠狠地刺了男爵一剑，要不是把美好的黄金国的绵羊一齐丢掉，你就不能在这儿吃花生和糖渍佛手。”老实人道：“说得很妙；可是咱们的园地要紧。”（傅雷译）

傅雷先生把全书最后一句话翻译得铿锵有力：“咱们的园地要紧”，充分表达了行动的紧迫性，不过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斟酌，“咱们还是种地要紧”或许更加符合伏尔泰的本意，因为他有意强调的其实是“种地”这一行动而不是属于“咱们的”园地，法语中表示所属的主有形容词也并不总是在中文里对应译出。

《老实人》的中译本在书名中省略了原著的副标题——“论乐观主义”，我们从中可以理解伏尔泰的写作意图，他所抨击的正是18世纪流行的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学说。作品的缘起要从1755年欧洲的一场灾难说起。当年发生于葡萄牙里斯本的大地震造成大约十万人死亡，几乎是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场地震在欧洲引发激烈争议。自古以来，人们总是难免抱怨世上的痛苦、灾难和罪恶。当时的欧洲人被这场史上最严重的地震所震惊，他们也难免产生疑惑：一个号称“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容许这样的灾难发生呢？既然如此，那么上帝根本就配不上那个荣誉（因而就不是上帝），那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非常糟糕，至少是一个“坏的”世界，根本不值得我们去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早年发表了《神义论》(1710)，他试图证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遵循理性的秩序，只要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就会发现任何事物（哪怕是人们厌恶和痛恨的那些事物）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秩序本身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所以这个世界必然是最好的世界。这种思想在很多人看来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合理安排有所呼应，故而在18世纪的法国有很多信奉者愿意从中寻找对现实苦难的解释，这也正是坎第德的哲学老师邦葛罗斯的思想来源。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反对这种以上帝的安排为最合理秩序的精神安慰。世间善惡一直是伏尔泰所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世上有善也有恶，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绝对悲观，真正的乐观主义是知道恶的存在而依然保持对善的向往和相信行动的力量。他笔下的老实人在尘世历险中终于摒弃盲目乐观主义，抵制了消极的悲观主义，也悬置了善恶辩论，最终以行动寻找生活下去的方式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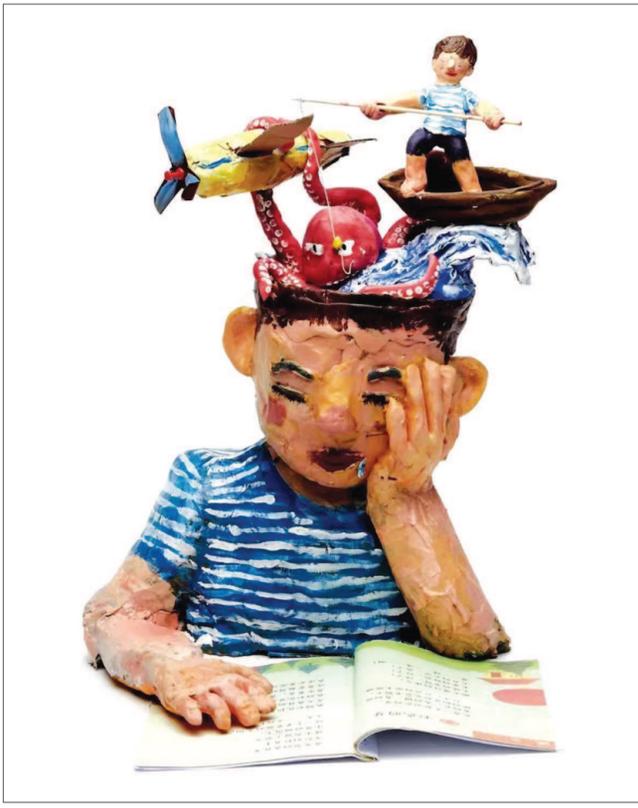
《老实人》的结局其实也是伏尔泰晚年生活的缩影。自从《哲学通信》(1734)在法国遭到禁止并被焚烧之后，伏尔泰常常在外省甚至在外国流亡。1758年底，伏尔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小城费尔奈定居下来，长达二十年。他在此地勤奋写作，完成了《老实人》等流芳后世的杰作，声誉远播，来自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的各方宾客前来拜访，费尔奈这个原来毫无生息的边陲小镇因而变得生机勃勃。《老实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冒险故事或成长小说，而是充分反映了伏尔泰乐观主义和行动哲学，正如他本人所言：“我为行动而写作。”

笔会

做了个梦——打败怪兽

(雕塑)

王杨舜之(8岁)



林徽因选编《大公报小说选》

卫建民

我在琉璃厂买到一册1936年出版的《大公报小说选》，是林徽因选编的。这本近九十年前出版的旧书，内页完整无损，独缺封面封底，书店做了修补，标价40元。旧书店的专家，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所以才像修复文物一样地精心。我买这本书，主要想看看选家的眼光，也想了解上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作者群。

萧乾谈这个选本的缘起：“在我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徽因一直是我的啦啦队。我每次从天津到北平举行约稿闲聊茶会，她总是不落空，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她热烈支持我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奖金，还从已刊的作品中选编出一本《大公报小说选》。”林徽因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热心读者，也是编者萧乾的铁杆支持者，这本选集，提炼出副刊所发小说作品的精华，检阅副刊的作者群，体现了林徽因个人的欣赏趣味和她对文学创作的观点。小说选不代表报社的立场，完全是选编者文学观、美学观的集中表现，更是副刊作品的二次展示。

选编一份报纸的文学作品，胸中要有一部新文学史的全景。林徽因在序中说：“关于这短篇技巧的水准，平均的程度，编选人却不要避嫌地提出请读者注意。无疑地，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的运用。生涩幼稚和

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的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这种决绝的口气，是对大公报文艺副刊作者作品的总判断。看看所选作家的名单，从沈从文、老舍、张天翼，到萧乾、季康、凌叔华，可以肯定地说，在30年代中期，这一批作家的创作就到了成熟期。

谈了她对小说创作总的判断，林徽因又在序言最后露出她的见识。她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不是从教科书和学院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创作实践，从每篇作品的实际衡文。“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向外，必需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显着活力真诚。”她衡文的眼光和她的艺术修养息息相关，甚至依稀可见她对

古建筑的理解和欣赏。如“横溢奔放”，“交错相辅”，就是描述殿宇檐角、斗拱梁柱的语言。

林徽因是建筑学家。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她和梁思成联袂到山西考察古建筑，让世人了解到一个封闭的省份里深藏的无价之宝。第一次读到她的《山西通信》，是享受她的散文之美，惊异于她的艺术感觉。其实，这些灵光一闪的文字，只是她的副产品。她写诗、写信、著文，没有一篇是端着架子、刻意为之。在给沈从文的一封信里，她说：“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觉得一万万分满足。”信里的这几句话，是林徽因创作的秘密。你说了千言万语，甚至出版厚厚的书，如没注意她这几句的率性坦白，等于什么也没说。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流转；更不用说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旬日来眼看到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这是抗战前夕，她和梁思成一行到了山西汾阳后写的《山西通信》里的摘记。她还去了我们县的兴唐寺，是坐着骡车，在傍晚到达度寺的。我见过一张他们的骡车队的黑白老照片，那种我熟悉的地田两边凹下去的土路，车夫头上的白毛巾，使我浮想联翩。夜宿古寺，她写了篇随笔，月色蛛网，断垣残壁，是对美丽古迹的惊叹。她惊叹我的家乡的美，我惊叹她的散文的美。初读《山西通信》，我心里就自言自语，这哪里是写文章呀！这是仙女下凡，因从没见过的人间美景而吃惊！美得到处使

人心慌心惊”，是赞美语的最高阶。林徽因病逝已近七十年。一个短命的天才，像流星划过夜空，却留下永恒的光芒！七十年了，网络、报刊、书籍，还在热议她对古建筑，对城市规划的贡献；热议她当年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小群体里的迷人风采；热议她数量不多的诗与散文，还有那些和诗与散文等同的书信。她在人间的生命只有五十二年，在中国历史里却进入不朽之域。她在北京八宝山的墓地，却是那么高雅、朴素、简洁。

《大公报小说选》的出版快九十年了。这本以一人之力选编的文学作品，是继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一册容量不大，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文学选本。老一辈作家在从事严肃的选编工作时，心底无私、眼光独到，是以年鉴的标准汰洗选择的。所以，我买的这本旧书，是百分之百的经典。